

# 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追求多方共赢

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体现社会公平,可以部分解决国企改革中老职工历史欠账的资金来源问题,体现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资产属性;同时,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

国有股减持或转持社保基金,成为丰富社保基金的重要渠道。

从我国改革的现实情况看,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体现社会公平,可以部分解决国企改革中老职工历史欠账的资金来源问题,体现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资产属性。早在2001年6月,国务院即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所得资金上缴社保基金。

2002年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存在的金融风险不仅主要来自银行系统和证券市场,还有第三个来源,即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国有企业老职工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工资收入和劳动保障,在整个社会向市场过渡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种风险。吴敬琏认为,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之机,将国有资产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途径归还老职工,符合运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创新来消除金融风险的主旨。当然,吴敬琏此处所指的国有资产,远不止上市公司国有股份。

其二,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社保基金仅仅推行了4个月,就因为股市暴跌被紧急叫停。因为当时,我国股市存在结构性问题,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使股票价格很难得到真实的市场体现。一旦大量非流通股流入市场,股市暴跌不可避免。

在现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大小非”解禁依旧对市场形成冲击,但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又增加了三年禁售期。同时,因社保基金以保值增值为目的,到期后也不是必须将所持股份变现,对于业绩好的

公司,也可选择分红的方式继续持有相应股份,这样一来,“大小非”减持对市场压力被大大缓解。

必须看到,内需不畅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难题,社保体系建设不到位是内需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保基金的丰富对于强化公共社保体系、拉动消费增长,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谋求各方共赢的同时,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也给社保基金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所持国有股份比例大,又需长期持有,对企业而言,社保基金不但是以投资获益为目的,而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强化股东能力也是当务之急。此外,随着社保基金基数的增大,对基金的监督管理也需加强,杜绝上海社保案这类案件的再度发生,是各方共同的责任。

# “55年医龄”的标准值得商榷

□黄哲雯

近日,30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泰斗级老中医获得了“国医大师”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当选者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也已74岁。来自新华社的报道称,国医大师是我国政府授予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最高荣誉,评选标准十分严格,要求当选者必须在中医学领域从业55年以上,并且医德高尚、学术成就卓著。

评选“国医大师”以推进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继承与创新,是件好事。但要求“当选者必须在中医学领域从业55年以上”,则有些机械。

诚然,中医讲究从医经验,要求一定的医龄作为“国医大师”的评选标准并不过分。但要求从业55年则有些不科学。事实证明,无论老年中医,还是中年中医、青年中医,其中都有医德高尚、学术成就卓越者,而且中年中医和青年中医中不乏超越老中医者。

55年医龄的标准不利于选拔中青年中医。相关调查显示,现在中医越来越少,如果再以荣誉评选上设置过高的门槛,难免会挫伤青年中医执业的积极性,不利于他们确立长远的职业规划,这也不符合设立“大师”的初衷。

评选“国医大师”的标准当然要严格,但严格并非要年长,严格要以科学作支撑,否则,“大师”的寓意就被祛魅化了,所谓的严格也就被形式化了。所以,还是把“当选者必须在中医学领域从业55年以上”的标准再放宽一些,给那些年富力强、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提供赢得荣誉的机会,唯有此,“国医大师”的评选才更具意义。

## 一分钟发布会

就“经济适用房摇号6连号”事件,武汉市政府近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一分钟左右——据报道,武汉市政府表示要依法维权对此事进行处理,但没给记者留下提问时间。

如此匆匆忙忙,有啥难言之隐?如果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记者打发掉,那就想错了。要知道,现在的记者最爱刨根问底,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你啥也不说并不等于人家搞不明白真相。

## 20万重奖举报

据中新社报道,为鼓励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湖南省检察机关将予以重金奖励,一般按照举报涉罪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数额高达2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

20万元的奖金的确让人心动,但让人难以乐观的是,在举报人遭报复、举报人人身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当下,又有多少人会为了拿到高额举报奖“铤而走险”呢?

## 打造“中国恋城”

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巫山县将以著名的长江巫峡神女峰传说为依托,在三峡库区腹心打造“中国恋城”,复建高唐观、阳台等古迹,重塑神女塑像,力图使“中国恋城”成为爱情基地和蜜月基地。

如此隆重的旅游规划,想来投资金额不是个小数目。不知巫山县是否做过相关论证?是否征询过百姓意见?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到处都需要用钱,而投巨资打造一个“爱情基地”,必要性又有几何呢?

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五大国有电企之一的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金沙江水电站,在被环保部门亮黄牌以后,但两家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无独有偶,据6月22日《新京报》报道,近日有关人士透露,2008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用海的行政项目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政府主导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查处的62个违法案件中,61个属于这种情况。



# 遏制环境违法从破解利益合谋着手

这一现象实在耐人寻味。金沙江水电开发项目之所以顶风而建,不把环保部的禁令当回事,恐怕与国企的牛气和身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照”不无关系。如果一些项目由政府主导,恐怕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而且,一旦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一些国企抱成团的话,也许就不仅是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处罚,而且其他违法行为恐怕也能逃过处罚。

而一些国企和地方政府部门之所以敢顶风违法,除了认为“国企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外,根本原因还是财大气粗,一些企业行政色彩浓厚,手眼通天,有些企业领导的行政级别

高于地方政府领导,不把环保执法部门放在眼里。即使受到处罚,也不过几万、十几万元钱的事,环境执法在这些企业面前难以奏效。

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国企的投资,无不有久旱盼甘霖之意。因为一家央企落户,地方财政收入有可能大增,不仅能够带动当地产业快速发展,进而拉动当地GDP增长,而且可以产生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些因素对于提升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来讲,好处不小。在官员考核重GDP的当下,不难理解有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将国有大型项目拉到自己治下的想法。环渤海那些违法建设项目,

金沙江上那些“没买票就上车”的水电项目,概莫能外。在如此情形下让一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可能确实有些“为难”。

有鉴于此,要避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就得让政府部门真正从经济利益中脱身,改变“唯GDP”的政绩考核模式。而要国企不再财大气无,势大无畏,则要打破行政垄断,让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就现实而言,也应让国企经营者和政府官员共同对环境违法承担责任。只有这样,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国企公然违反环境法律的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 褒奖官员应“以精神奖励为主”

“搞好县域经济最高奖100万元”——据6月18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为加快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四川省政府日前出台了《县域经济发展激励奖励办法》,对全省经济发展好的县,达到奖励标准的县(市、区),将一次性奖励60万-100万元。

为鼓励和刺激县域经济发展而出台奖励官员的做法,早在2004年广东省就已实行。在广东省2005年公布表彰的名单中,全省共有47个县(市)获得2004年度县级领导班子奖励,其中有14个县(市)的奖金超过了100万元。此后,国内不少省市区政府相继出台了重

奖“政绩”突出官员的举措,但随之引发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争议始终围绕着“该不该奖”、“奖多少为当”之间展开。

诚然,官员也是劳动者。奖励劳动者本无可厚非,况且《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公务员集体,应该给予奖励……也可以给予一次性的奖金。但《公务员法》着重强调的还是,应“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在这方面,有些省市区政府已经定了一个“度”。如2002年实施的《云南省行政奖励暂行规定》就明确规定,给予个人奖励的,即便记一等功,也只能“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奖章和证书,

发给不超过6000元的奖金或者奖品”。

官员是人民公仆。“重奖”政绩突出的官员,实际上还牵涉一个价值认可和取向问题。按理说,搞好县域经济,乃县级政府官员的职责所在,这与保安守好大门、司机开好安全车、医生看好病、交警站好岗一样,并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对于各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地区、政府的奖励也是以“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精神奖励为主”。

因此,政府奖励“业绩”突出的官员,仍应坚持现行法律所规定和广大民众所认可的价值取向,绝不可将对官员的绩效考核和奖励与一些企业家的业绩等同起来,否则,或许会在民众中产生一些不良感觉。

# 首都高校师生代表座谈会 学习蔡一清先进事迹体会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钱晓虎 吴登峰)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23日在京联合举办座谈会,邀请首都高校师生代表畅谈学习蔡一清先进事迹体会。与会高校师生表示,要像蔡一清那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四个新一代”的要求,让青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公方彬教授说:“蔡一清以生命诠释了‘四个新一代’的实践意义和价值。学习蔡一清,就是要像他那样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奠基自己的人生追求,以高超的军事素质与军事技能彰显当代青年军人的使命意识和履职能力,在关键时刻敢于以生命来表现忠诚的伟大牺牲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俞楠楠说:“学习蔡一清,就是要像他那样自觉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从现在做起、脚踏实地,

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斗,在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壮丽的青春。”

北京交通大学大三学生马千里动情地说:“蔡一清的一生让我看到了一名优秀军人灵魂深处最闪光的东西。这在我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报军报国的种子,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携笔从戎的信念,他的事迹将是我今后不断前行的动力。”

军事科学院徐胜利博士说:“每一名志在报国的青年官兵,都应该像蔡一清那样,时刻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满腔热情地投身军事训练,用默默的牺牲奉献体现军人的价值。”

座谈会上,北京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汪文明、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教授洪廷姬等师生代表也纷纷表示,要以蔡一清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工作,为祖国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

# 国家指令计划将“淡出”民法通则

(上接第1版)上述规定与现行法律中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明显不适应。据此,草案建议删去上述两条中有关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的规定。与此同时,对于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有关指令性计划规定的内容,草案也建议修改。李适时说,该法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该法中有关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经营等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据此,建议删去该法中涉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关指令性计划的规定。事实上,上述两项“修法”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我国现行法律进行全面清理工作中的一部分。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有关方面对现行200多件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提出近2000件清理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天分组审议了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拟废止8件、修改59件141条法律。

这是我国20多年来首次集中清理现行法律,也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首次以“包裹立法”形式清理法律。

“这次法律清理工作把清理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明显不适应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之间明显不一致、不协调的突出问题上,主要解决法律中的‘硬伤’。”李适时说。

(上接第1版)他善于正确判断新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 he 统帅大兵团连续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確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誉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对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息。

同志们、朋友们!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贞不屈、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英勇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去,这是我们的美德。”

“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学习和对党的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领导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地方,总能扎根下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

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人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同志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加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把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